

# 代后论 汉唐时期的合浦

——以传世文献为视角的探讨 王楠

古代合浦地区自秦汉时代被纳入中原王朝大一统秩序的版图伊始，其史前时期的生态文明即进入了一个长时段的“用夏变夷”的历史周期。滨海地域的合浦，在汉唐时期既拥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美誉和光环，亦经历了自身社会变迁中的种种波折与起伏。探讨合浦地区于汉唐之间的历史轨迹，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解读岭南地区进入大一统秩序后的开发历程及中古时代多元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社会生态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 一、两汉时期

### （一）新秩序的建立

秦灭六国后，旋即开启了统一岭南地区的历史进程。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岭南首次被纳入中央大一统王朝的管辖范围，标志着岭南地区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秦末，中原失驭、群雄蜂起，南海郡尉赵佗趁机控制了岭南，割据自立。汉王朝建立后，受国力的制约，岭南长期未获得统一。随着国力恢复，武帝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开始大规模用兵，征服四夷。<sup>[1]</sup>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任命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讨伐南越。<sup>[2]</sup>次年冬，南越国平定。汉王朝调整了岭南地区的行政区划，将岭南划为南海、苍梧、合浦、郁林、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九郡。<sup>[3]</sup>

在平定南越的过程中，汉王朝为了减少统一的阻力，有条件地保留了原来的统治阶层。《水经注》引刘欣期《交州外域记》：

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越王，路将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雒将主民如故。<sup>[4]</sup>

所谓“雒将”，《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钢印青绶。”<sup>[5]</sup>一般认为雒将就是越人部落首领，具有治民的权力。上文表明，汉王朝不仅任用归顺的官吏，还执行“诸雒将主民如故”的政策。东汉初雒将之女叛乱表明雒将的长期存在<sup>[6]</sup>。此外，国家在岭南地区不征收赋税<sup>[7]</sup>，极大地保护和尊重了当地人的经济利益。在这样宽松的政策之下，除珠崖、儋耳两郡，岭南地区长期处于比较安定的状态。但这种稳定的基础是中央政府“无为而治”，一旦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理，矛盾的出现则难以避免。

东汉建武十六年（40年），雒将之女二征起事<sup>[8]</sup>，九真、日南、合浦当地人响应，攻略六十五城。<sup>[9]</sup>关于本次叛乱的原因，《后汉书》和清代的《广西通志》有不同的记载。《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云：“征侧者，麓泠县雒将之女也。嫁为朱鸢人诗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sup>[10]</sup>根据《后汉书》的记载，“甚雄勇”是诗索入狱的直接原因，折射出地方官员对当地人的戒备心理。二征引发三郡叛乱，攻略六十五城，其规模一方面反映了汉代以来岭南地区统治的薄弱，另一方面显示了当地人不满意情绪的积压与释放。

清代金鉷《广西通志》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广西通志》记载交趾太守苏定向征侧之夫索要钱财不得，将其杀掉，从而引发了二征的叛乱。<sup>[11]</sup>我们在早期文献中没有发现苏定索要钱财一事，因此这条记载的来源甚为可疑。但苏定很可能不是清廉之官，马援在平定叛乱后上书光武帝可以为此事做一注脚。马援称：“太守苏定张眼视钱，眯目讨贼。”<sup>[12]</sup>即使《广西通志》的记载不足为据，但苏定极有可能为昏庸贪婪之辈，这或许就是引起当地人不满意的重要因素。

二征的叛乱引起了东汉政府的极大重视，朝廷派遣功勋赫赫的马援前往平定叛乱。马援上书光武帝要求追究交趾太守苏定的责任，称其“怯于战功，宜加切敕”<sup>[13]</sup>。显然，马援认为苏定最大的责任是镇压不力与军事失败，这也为马援平定二征后在岭南地区采取更为强硬的治理措施提供了解释。

马援在岭南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在政治方面，“雒将主民如故”的政策被废除，“悉定郡县为令长也”<sup>[14]</sup>，雒将失去了治民的权力。二征以雒将之女的身份叛乱，无疑对雒将的存在产生冲击。这次叛乱的规模显示了雒将巨大的号召力，中央的权威遭到严重动摇，使得中央决心废除雒将制度。废除雒将后，来自中原的流官成为岭南地方官的主要来源。据谢启昆《广西通志》，西汉时期广西境内官吏可考者寥寥无几，而东汉时期广西境内官吏可考者多达二十六人。<sup>[15]</sup>其二，在习俗方面和法律方面，“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sup>[16]</sup>。马援废除与汉法严重背离的制度，同时结合当地风俗制定新的统治政策。通过平定叛乱与制定新的治理政策，中央政府在交趾地区确立了中央的权威和新统治秩序。

## （二）贬谪地背后的合浦

自古以来，岭南地区作为炎徼荒裔、山陬海噬之地存在于古人固有的知识体系中。除了地陲偏远，严重损害人体健康的瘴疠也是古人对岭南避之不及的重要原因。<sup>[17]</sup>地理上的遥远和致命的瘴疠使得岭南成为贬谪官员、流放囚徒的重要地区。<sup>[18]</sup>秦汉以降，岭南地区流人、贬官的记载盈千累万。合浦作为岭南最早开发的区域之一，在贬谪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两汉时期。

表 1<sup>[19]</sup>

汉唐时期迁徙刑和贬谪官至合浦的事例统计表

序号	时间	人名	流放地	出处
1	汉成帝时	王章妻女	合浦郡	刘向《古列女传》
2	汉成帝时	浩商家属	合浦郡	《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
3	汉哀帝时	躬母圣家属	合浦郡	《汉书》卷四十六《蒯伍江息夫传》
4	汉平帝时	中山王后	合浦郡	《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
5	汉平帝时	傅晏、董恭等	合浦郡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
6	汉平帝时	冷褒、段犹等	合浦郡	《汉书》卷八十六《何武王嘉师丹传》
7	汉平帝时	孙宠等	合浦郡	《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传》
8	汉平帝时	毋将隆	合浦郡	《汉书》卷七十七《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
9	汉平帝时	吕宽家	合浦郡	《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10	汉平帝时	史立、丁元、赵昌	合浦郡	《汉书》卷七十七《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
11	汉平帝时	张由	合浦郡	《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下》
12	汉平帝时	淳于长妻子	合浦郡	《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
13	汉章帝时	邳寿	合浦郡	《后汉书》卷二十九《邳寿传》
14	汉和帝时	邓叠、邓磊、郭璜、 郭举家属	合浦郡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
15	汉和帝时	阴轶	合浦郡	《后汉纪》卷十四《孝和皇帝纪》
16	吴	李侯	合浦郡	《南方草木状》卷上
17	北魏	元庆和	合浦郡	《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传》
18	唐玄宗时	吉温	合浦	《旧唐书》卷一百六《杨国忠传》
19	唐肃宗时	张均	合浦	《旧唐书》卷十《肃宗纪》
20	唐肃宗时	陈希烈	合浦	《全唐诗》卷一百二十一 <sup>[20]</sup>

表 1 中共计有二十例，其中十五例发生在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仅有五例。日本学者大庭修曾对两汉徙岭南事例进行过细致的讨论，指出将这些犯有大逆不道罪者或连坐者徙往岭南是为了避免他们和北方匈奴、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勾结引发叛乱。<sup>[21]</sup>他认为汉代徙迁刑是基于秦代以来的徙民政策的传统，目的在于充实北方或南方的边境地区。迁徙地是选择了最需要开发的土地，即汉文化发展最薄弱的地区。<sup>[22]</sup>但对于中央政府来说，选择合浦作为流放地绝非仅因为合浦是汉文化发展最薄弱的地区，更重要的因素是合浦地理位置所造就的经济和军事地位。清代顾祖禹曾在《读史方輿纪要》中这样描述合浦：“（廉州）府南滨大海，西距交阯，固两粤之藩篱，控蛮夷之襟要，珠官之富，盐池之饶，雄于南服”<sup>[23]</sup>，指出了合浦极具重要性的经济与军事地位。

众所周知，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在海外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汉书》记载，从合浦、徐闻等地出发，可以抵达都元、邑卢没、谶离、夫甘都卢、黄支、皮宗等国，最远者可达印度半岛。<sup>[24]</sup>现代考古在合浦发现大量来自欧洲、南亚、中亚、西亚的舶来品，如琥珀、玛瑙、水晶、玻璃等，表明当时中西海上交流的盛况。有学者认为汉王朝向岭南地区扩张实际上有着一定的商业目的。<sup>[25]</sup>随着海上贸易的逐渐兴盛，合浦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加强对合浦的控制是汉王朝保证海上丝绸之路通畅的必要选择。

从军事上来看，合浦郡日益成为中央王朝控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及儋耳、珠崖的军事要地。<sup>[26]</sup>据说秦尉佗曾驻军于合浦北峨山，<sup>[27]</sup>其山在“府城西北一百里”，以峰势嵯峨而名<sup>[28]</sup>。汉武帝时期曾以合浦为基地征服海南岛。《汉书》记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sup>[29]</sup>

东汉初，在征讨二征的军事行动中，合浦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后汉书》记载，楼船将军段志至合浦而卒。<sup>[30]</sup>合浦极有可能是段志所率水军的驻扎地。马援也从合浦出发，“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sup>[31]</sup>。对“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的理解，学者们有不同看法。马伯乐认为马援率军沿海岸陆行至交趾，而王承文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认为马援行军主要依靠海上航运。<sup>[32]</sup>而无论是陆地行军还是依靠海运，合浦以其便捷的交通条件在马援平定二征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直到明初，合浦都是前往安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清道光十四年所修《廉州府志》收录明嘉靖年间郡守何御志的序：“宣德以前，安南为郡县，凡富商大贾之走安南，以钦廉为水陆总汇，而贸迁有无者众矣。”<sup>[33]</sup>这足以显示在通往交趾的交通路线中合浦所具有的地位，而合浦的经济、军事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地理位置所形成的便捷的交通。西晋时期，为了统治海南岛，还在合浦郡设朱卢县，管辖海南岛。谭其骧指出合浦对经略海南岛的意义，“合浦港既是商港，也应是军港，以对付岛上人民的反抗斗争”<sup>[34]</sup>。

综上所述，合浦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成就了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地位，而这正是汉王朝将合浦作为岭南徙迁刑最主要迁入地的重要背景。而这些移民多具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对合浦的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产生推动作用。

### （三）动荡的东汉时期

二征起义被平定后，中央王朝调整了对岭南的统治策略。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当地居民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随之变化。这个时期关于战争的记载频频出现在正史中。



表 2 两汉时期与合浦相关的战争表

序号	时间	事件	出处
1	建武十六年 (40年)	征侧、征贰引九真、日南、合浦蛮叛	《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
2	元初元年 (114年)	苍梧、郁林、合浦盗贼	《后汉书》志第十六《五行四》
3	元初二年 (115年)	苍梧蛮夷引郁林、合浦蛮汉叛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4	元初三年 (116年)	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叛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五》
5	光和元年 (178年)	合浦、交趾乌浒蛮引九真、日南民叛	《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第八》
6	光和四年 (181年)	交趾刺史讨交趾、合浦乌浒蛮	《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第八》
7	中平元年 (184年)	交趾屯兵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	《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第八》

两汉时期与合浦相关的战争共计七例，其中六例和越人密切相关。关于越人叛乱的原因，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吏治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东吴薛综曾上书指出“（交趾）在九甸之外，长吏之选，类不精核”，刺史朱符便因贪暴被杀。<sup>[35]</sup>《后汉书》也记载：“（交趾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迁代，故吏民多怨叛。”<sup>[36]</sup>前文指出，二征的叛乱便和太守苏定的贪腐不无关系。

史料曾明确记载，合浦也受到吏治问题的困扰。《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第六十六》云：“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sup>[37]</sup>直到孟尝任太守时这种状态才得以改善。但吏治问题并不能完全解释东汉越人频繁的叛乱活动，因为众多的中原移民同样受到吏治问题的困扰，但叛乱活动数量却低得多。《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第八》云：“交趾屯兵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sup>[38]</sup>据《后汉书》卷三十一《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二十一·贾琮传》，此次叛乱的直接原因是“赋敛过重……民不聊生”<sup>[39]</sup>。但此次叛乱却不见越人的身影。中平元年（184年）交趾屯兵叛乱的事例表明吏治问题和越人叛乱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吏治问题并不是越人叛乱的唯一原因。

因此，越人在东汉多次卷入叛乱可能还有其他原因。马援平定二征后，中央政府致力将中原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推行到岭南地区。锡光和任延就因在岭南推行中原文化成功而名垂青史。<sup>[40]</sup>但政府推行移风易俗的政策必然触及越人的利益，故绝无一帆风顺之可能。

古代中原人往往将自身想象为身居中央之国的文明人，而对四邻冠以轻蔑性称呼，同时存在歧视性的认识。葛兆光曾指出“古代中国人想象自己的‘文明’，而想当然地认定四夷的‘野蛮’”，“挟着本土的想象去看异域的生活时，总是把一些恐怖怪异、不可理喻的事情附益在自己并不熟悉的空间里”。<sup>[41]</sup>合浦地区的居民也难逃中原人的此类想象。从现存对岭南地区居民的描述即可知当时人所存在的偏见与歧视性看法。《后汉书》注引万震《南州异物志》云：“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行旅，辄出击之。……”<sup>[42]</sup>贾捐之认为骆越“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本不足郡县置也”<sup>[43]</sup>。古代合浦地区的主要居民正是“乌浒蛮”和“骆越”，因此移风易俗是中原官员抵达岭南后首要的任务。《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第六十六·任延传》云：

建武初，延上书愿乞骸骨，归拜王庭。诏征为九真太守。光武引见，赐马杂缿，令妻子留洛阳。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余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

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阯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王莽末，闭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贡献，封盐水侯。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sup>[44]</sup>

《任延传》一千余字，近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记载其在岭南地区推行教化的成果，显示他推行教化的典范性，但很难想象岭南其他官员也能取得类似成就。考虑到交州地区长期存在吏治的问题<sup>[45]</sup>和频发的叛乱活动，东汉地方官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必定遇到不少困难与阻碍。

正史中记载了强力推行移风易俗的措施带来的严重后果。《汉书》卷六十四《贾捐之传》云：“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崖郡……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sup>[46]</sup>此外，官吏的猎奇心理也可能加剧与当地居民的矛盾。薛综曾上书吴帝分析珠崖弃置的原因：“珠崖之废，起于长吏睹其好发，髡取为鬘。”<sup>[47]</sup>这种带有猎奇性质的事件不仅远离了教化的本意，而且增加了汉官和越人之间的不信任。

由移风易俗而产生的矛盾夹杂着地方官在经济上的剥削使当地人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频频发生的反叛显示出矛盾的尖锐。因此，我们应该谨慎评价东汉在岭南推行教化的实际状况。一方面，教化未能达到的地区颇广。《太平御览》引三国万震《南州异物志》云：“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sup>[48]</sup>高凉、宁浦都是由汉合浦郡分置而来，可知汉代合浦郡广泛存在越人部落组织，而这些部落人群在政治上远离中央政权，在文化上远离中原文化，汉王朝的教化远远没有抵达这些地区。另一方面，到东汉末，以交阯太守锡光和九真太守任延等著名“循吏”所代表的“华风”影响基本荡然无存。<sup>[49]</sup>

## 二、三国两晋时期

### (一) 合浦港的军事化

自东汉马援开始，广西合浦一带即成为控驭安南的军事战略要地。<sup>[50]</sup>随着朝代的更替和政治局势的变迁，三国时期合浦的军事地位更加凸显。东吴统治时期，合浦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地位弱化，而作为控驭交州地区军事据点的作用得到强化。在东吴与西晋争夺交州地区的斗争中，合浦对东吴最终恢复对交州地区控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派步骘为交州刺史，成功地实现了对交州的控制。咸熙元年（264年），东吴交趾郡吏吕兴杀太守附魏，并得到了日南、九真两郡的响应。吕兴附魏后，魏下诏要求吕兴进攻合浦，诏书中称“兵临合浦，告以祸福”<sup>[51]</sup>。在与交趾相邻的郡中，南边的日南和九真响应了附魏的行动，而东北的郁林郡和合浦郡为吴所控制。相比郁林郡，合浦显然更具战略重要性。次年，代魏而起的西晋便展开了进攻合浦的军事行动。

西晋泰始元年（265年），晋交趾太守杨稷遣毛灵、董元等进攻合浦，战于合浦古城。关于合浦古城的位置，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四“漳平废县”条曰：“又合浦故县，旧志云：在今县西南。汉初县置于此。后移而东。三国吴孙皓末，交趾太守杨稷据交趾，遣将毛灵等攻合浦，战于古城，大败吴兵，即此城云。”<sup>[52]</sup>在这次战争中吴将陶璜大败，退守合浦。<sup>[53]</sup>三年后，东吴在交趾地区对西晋发起反攻。

吴宝鼎三年（268年），孙皓遣交州刺史击交趾，但这次军事行动却以失败告终，史书记载这次战役的结果是“兵散还合浦”。次年，东吴再次出兵征讨交趾，“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翊、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勣、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sup>[54]</sup>。但由于建安海道不通，次年兵还。东吴建衡三年（271年），虞汜、陶璜破晋所置守将。在争夺交州等地上，东吴获取了胜利。

短短七年，晋吴两国在交趾地区交战四次。最初西晋处于攻势且以夺取合浦为目标，而后三次东吴处于攻势。对孙吴来说，能恢复对交州的统治，合浦至关重要。西晋在西南地区缺乏足以经略交州的要地。西晋若经略交州，必经与交趾接壤的兴古郡<sup>[55]</sup>。兴古郡及交趾郡内大片地区地势险要，重峦叠嶂，无论是行军还是后勤补给都相当的困难，而合浦占有经略交州地区的有利地位。在整个汉唐时期，经合浦前往安南都是通往安南最重要的通道。<sup>[56]</sup>总而言之，合浦的军事意义至关重要，在分裂时期各个政权更加重视对具有战略地位的合浦的争夺。

### (二) 北方家族势力的发展

自岭南进入中原王朝秩序之始，北方移民就成为开发岭南的一支重要力量。一方面，他们与越人杂居，接受了越人的习俗，吸取了越人的长处；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农耕技术带到南方。<sup>[57]</sup>各类移民对岭南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北方移民家族在岭南开发史上发挥了显著作用。汉魏时期，一些北方家族或躲避战乱或任官而迁

居交州，个别家族在交州地区数代为官，形成颇有影响的地方势力。

《三国志》卷四十九《士燮传》：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其先本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补尚书郎，公事免官。父赐丧阍后，举茂才，除巫令，迁交阯太守。

弟壹，初为郡督邮。刺史丁官征还京都，壹侍送勤恪，官感之，临别谓曰：“刺史若待罪三事，当相辟也。”后官为司徒，辟壹。比至，官已免，黄琬代为司徒，甚礼遇壹。董卓作乱，壹亡归乡里。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壹领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黡领九真太守，黡弟武，领南海太守。<sup>[58]</sup>

又《晋书》卷五十七《陶璜传》：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也。父基，吴交州刺史。……皓以璜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以千数，于是遣还。……

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朝廷乃以员外散骑常侍吾彦代璜。彦卒，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彦。秘卒，州人逼秘子参领州事。参寻卒，参弟寿求领州，州人不听，固求之，遂领州。寿乃杀长史胡肇等，又将杀帐下督梁硕，硕走得免，起兵讨寿，禽之，付寿母，令鸩杀之。硕乃迎璜子苍梧太守威领刺史，在职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绥，后并为交州。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

璜弟潜，吴镇南大将军、荆州牧。潜弟抗，太子中庶子。潜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恭豫，并有名。湮至临海太守、黄门侍郎。猷宣城内史，王导右军长史。湮子馥，于湖令，为韩晃所杀，追赠庐江太守。抗子回，自有传。<sup>[59]</sup>

又《宋书》卷九十二《杜慧度传》：

杜慧度，交阯朱戴人也。本属京兆。曾祖元，为宁浦太守，遂居交阯。父瑗字道言，任州府为日南、九德、交阯太守。……

慧度，瑗第五子也。初为州主簿、流民督护，迁九真太守。瑗卒，府州纲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旷职，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辞不就。七年，除使持节、督交州诸军事、广武将军、交州刺史。……少帝景平元年，卒，时年五十，追赠左将军。……以慧度长子员外散骑侍郎弘文为振威将军、刺史。……太祖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为交州刺史，弘文就征。会得重疾，牵以就路，亲旧见其患笃，劝表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节三世，常欲投躯帝庭，以报所荷，况亲被征命，而可宴然者乎，如其颠沛，此乃命也。”<sup>[60]</sup>

根据正史的记载，士燮、陶璜和杜慧度家族均来自北方地区，或避战乱，或任官，后定居于交州地区。这三个家族的父子兄弟在交州长期任官，在地方上具有相当的威望，同时拥



有一定的独立性，中央政府不得不为之防备。士燮在去世后，孙权任命陈时接替士燮之子为交趾太守，士燮之子拒命被杀。士燮家族命运由此完全改变，士燮之弟士壹、士黈，士燮之子士主廩被免为庶人。数年后，士壹、士黈被杀。士家在东吴政权的严厉打击之下，很快走向没落。

相比之下，陶璜家族和杜慧度家族显得十分幸运。陶璜家族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任官，可以说显赫一时，而杜氏家族更是连绵数百年。杜氏家族的发展轨迹和岭南历史的变迁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刘宋时期，杜慧度之子杜弘文对中央政府表现得十分恭顺。面对宋明帝征其入朝，杜弘文云：“吾仗节三世，常欲投躯帝庭。”而从梁陈开始杜氏家族已经开始向交州本土溪洞首领转化，到唐代交州杜氏家族完全以蛮夷首领形象出现在史书中。<sup>[61]</sup>《安南志略》记载：“杜英策，溪峒豪也。唐德宗时为安南副都护。”<sup>[62]</sup>唐懿宗时杜守澄被唐官员所杀，“其宗党遂诱导群蛮陷交趾，朝廷以杜氏强盛，务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赠守澄父存诚金吾将军，再举鄂杀守澄之罪，长流崖州”<sup>[63]</sup>。《资治通鉴》也记载：有杜守澄者，自齐、梁以来拥众据溪洞，不可制。<sup>[64]</sup>杜守澄乃唐懿宗时期人，距齐梁时代已数百年，《资治通鉴》所谓“杜守澄者”当指杜氏家族。

### 三、南朝隋唐时期

#### （一）国家权力的强化

汉末天下大乱，兵连祸结，人民流离失所。据学者研究，东汉人口曾突破西汉的最高值六千万，但是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仅略高于三千万<sup>[65]</sup>，人口减少高达50%。合浦地区的编户也所剩无几。东汉合浦郡有“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户“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人<sup>[66]</sup>，而两晋合浦郡仅两千户<sup>[67]</sup>。

有学者指出合浦郡人口减少有政区调整的因素。的确，汉末至晋初合浦郡行政区划有所调整。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孙权分高凉县为高凉郡，分合浦北为宁浦郡<sup>[68]</sup>。但实际上，政区调整并非主要因素。据《晋书》记载，高凉郡有两千户，宁浦县一千二百余户。<sup>[69]</sup>因此，西晋时期合浦、高凉、宁浦三郡共计五千二百余户，和东汉时两万三千多户相比，骤降近八，比全国同期数据高两成多。此外，西晋合浦郡还领朱卢县辖海南岛，故五千二百户中还包括海南岛的户口数，三郡的户口数实际更低。

人口脱籍很可能是这个时期户籍人口剧降的主要因素。东汉以来赋税沉重，合浦地区战争频繁，为了逃避战乱和沉重的负担，山高林深之地成为避难所。<sup>[70]</sup>孙吴薛综曾上书云：“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未绥，依作寇盗，专为捕逃之藪。”<sup>[71]</sup>孙吴华覈进谏吴帝云：“合浦以北，民皆摇动，因连避役，多有离叛，而备戍减少，威镇转轻，常恐呼吸复有变故。”<sup>[72]</sup>此外，合浦港口军事化引起的经济恶化可能也影响户口数。

在国家掌握户口急剧下降的时候，俚僚却相当繁炽。西晋平吴后，陶璜上书称：

交土荒裔，斗绝一方，或重译而言，连带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且连接扶南，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往隶吴时，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吏。臣以尫弩，昔为故国所采，偏戍在南，十有余年。虽前后征讨，剪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窜。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消刃，礼乐是务。而此州之人，识义者寡，厌其安乐，好为祸乱。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唇齿，唯兵是镇。<sup>[73]</sup>

陶璜之父陶基官至交州刺史，陶璜的经历亦多与交州地区相关<sup>[74]</sup>，故熟稔交广两地，其分析应该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形。陶璜认为俚僚之人居“深山僻穴”之处，凭着“土地阻险”，和其他势力互相援引，“历世不宾”，对政府控制的郡县民众有着很大的威胁。因此，他提出以军事镇压为核心的统治策略。

东晋南朝时期，俚僚炽盛是岭南的普遍情况。在卢循起义中，李子逊、李弈、李脱等人盘结俚僚，各有部曲，李弈引诸俚率五六千人为卢循所用。<sup>[75]</sup>刘宋泰始年间，从合浦郡中分置临漳郡。史籍中这样记载临漳郡的情况：“夷僚<sup>[76]</sup>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sup>[77]</sup>《南史》云：“广州诸山并俚僚<sup>[78]</sup>，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之。”<sup>[79]</sup>《南齐书》云：“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僚<sup>[80]</sup>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sup>[81]</sup>面对诸多的俚僚，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

对“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国家采取“因而署之”的政策，这个政策自东晋“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sup>[82]</sup>东晋政府把服从中央政府的蛮酋纳入中央官僚体系之下，给他们的“酋帅”“洞主”予以王、侯等封号加以笼络。

对于拒绝服从中央的俚僚则采取军事征服政策。整个南朝时期，国家对俚僚的征伐不断。刘宋陈伯绍“率军伐俚”<sup>[83]</sup>，萧梁兰钦征讨“长乐诸洞”和陈文彻兄弟<sup>[84]</sup>。陈广州刺史马靖“甲兵精练，每年深入俚洞，又数有战功”<sup>[85]</sup>，萧介“征诸山洞”<sup>[86]</sup>。通过历朝不断的征服行动，国家在岭南地区大量增设州郡，俚僚之地逐步进入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隋书》称梁武帝“开拓闽、越，克复淮浦，平俚洞，破牂柯，又以旧州遐阔，多所析置”<sup>[87]</sup>。如合浦所在的越州初领九郡，到萧齐时期竟多达二十个郡<sup>[88]</sup>。与此同时，隶属于国家的编户也在增加。刘宋时期，合浦郡户籍人口仅有九百余户<sup>[89]</sup>，历齐、梁、陈三朝到隋初，合浦郡已经增加到两万八千多户<sup>[90]</sup>。尽管有人口增殖的原因，将俚僚编入户籍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 （二）溪洞豪族势力的盛衰

东晋南朝隋唐时期，强大的溪洞豪族是岭南地区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高凉冯氏、交州杜氏、钦州宁氏等家族都曾在岭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钦州宁氏正是岭南西部沿海

地区最大的溪洞豪族。<sup>[91]</sup>在钦州宁氏之前，陈檀曾控制过合浦地区。《宋书》记载：

广州诸山并俚、僚<sup>[92]</sup>，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苦之。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帅陈檀归顺，拜龙骧将军。四年，檀表乞官军征讨未附，乃以檀为高兴太守，将军如故。遣前朱提太守费沈、龙骧将军武期率众南伐，并通朱崖道，并无功，辄杀檀而反，沈下狱死。<sup>[93]</sup>

陈檀的归顺可能是形势逼迫下的顺势而为。《宋书》卷八十六《刘劭传》云：“先是遣费沈伐陈檀，不克。乃除劭龙骧将军、西江都护、郁林太守，劭既至，率军进讨，随宜剪定。”<sup>[94]</sup>

在刘劭的征讨下，陈檀归顺了中原王朝，同时被任命为龙骧将军。但在南朝，龙骧将军一般是加官或散官性质，实质性意义不大。陈檀提出征讨未附之后被任命为高兴太守，刘宋政府利用溪洞豪族的矛盾相互制约之意非常明显。

史籍中没有陈檀家族的记载，但陈檀合浦大帅的身份应该有家族势力的支撑，这个家族或许与后来的雷州陈氏相关。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一直属于合浦郡管辖，也就是说雷州半岛在刘宋时期有可能属于陈檀家族的势力范围。而南朝隋唐时期，雷州半岛的确存在一个溪洞豪族——陈氏家族。张说为宦官杨思勖母亲所写的碑文《颍川郡太夫人陈氏（神道）碑（铭并序）》称杨思勖母亲“雷州大首领陈玄之女，罗州大首领杨历之妻”<sup>[95]</sup>。王承文通过分析唐人房千里《投荒杂录》中所载《牙门将陈义传》认为有关雷神陈义的神话出现在南朝中期。<sup>[96]</sup>可见早在南朝时期，雷州陈氏已经成为溪洞豪族。尽管没有证据，但仍可推测陈檀或许与后来的雷州陈氏家族有一定的关系。<sup>[97]</sup>陈檀被杀后，雷州陈氏的势力可能出现收缩，钦州宁氏逐渐成为岭南西部沿海最大的溪洞豪族。

据《宁越郡钦江县正议大夫碑》和《刺史宁道务碑》<sup>[98]</sup>的追溯，钦州宁氏起源于中原地区，后移民到岭南地区。梁陈时期，钦州宁氏已经成为岭南西部沿海最大的溪洞豪族。

<sup>[99]</sup>陈朝宁逵担任安州刺史后，宁氏家族定居于钦州。陈至唐代，钦州宁氏父子兄弟在钦州、合浦等地长期任官，保持权力不坠。宁猛力据南海，“令宣治大廉洞，而自居钦江”<sup>[100]</sup>。宣即宁猛力兄弟宁宣，大廉洞即合浦<sup>[101]</sup>。隋初，宁猛力“白云与叔宝同日生，当为天子，不肯入朝”<sup>[102]</sup>。宁猛力去世后，其子宁长真袭刺史一职。

武德四年（621年），李渊遣李靖安抚岭南诸州。次年，宁长真与宁宣归顺新王朝。《资治通鉴》记载此事云：“广州贼帅邓文进、隋合浦太守宁宣、日南太守李暎等并遣使来降。”<sup>[103]</sup>但宁宣很快去世，唐任命其子宁纯任廉州刺史，其族人宁道明为南越州刺史。<sup>[104]</sup>宁氏父子兄弟归顺新王朝的同时也被任命为地方官，表明唐初溪洞豪族首领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势力。

唐初岭南地区局势相当复杂。《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传》载：

（宁）道明与高州首领冯暄、谈殿据南越州反，攻姜州，宁纯以兵援之。八年，长真陷封山县，昌州刺史庞孝恭擒击暄等走之。明年，道明为州人所杀。未几，长真死，子据袭刺史。冯暄、



谈殿阻兵相掠，群臣请击之，太宗不许，遣员外散骑常侍韦叔谐、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淹持节宣谕，暄等与溪洞首领皆降，南方遂定。<sup>[105]</sup>

冯暄乃洗夫人之孙、冯盎之兄。《旧唐书》卷一百九《冯盎传》记载冯盎归顺之后，“高祖以其地为罗、春、白、崖、儋、林等八州，仍授盎上柱国、高罗总管，封吴国公，寻改封越国公。拜其子智戴为春州刺史，智彧东合州刺史”<sup>[106]</sup>。冯盎父子获得唐王朝的任命，以溪洞豪族首领身份获得了唐王朝的认可并取得了地方控制权，而未见冯暄获得任命的记载，其发动叛乱时身份仍是高州首领。不过隋朝时冯暄曾担任过罗州刺史。<sup>[107]</sup>据乐史《太平寰宇记》，刘宋始置罗州，齐至隋初因之。炀帝废罗州属高凉郡，唐武德五年（622年）复置。<sup>[108]</sup>唐代复置罗州后，冯暄却未获得任命，这也许是促使冯暄起兵的重要原因。

宁道明与冯暄所进攻的姜州乃武德五年（622年）所置，下辖封山、东罗、蔡龙三县。<sup>[109]</sup>封山县乃南齐封山郡，隋文帝改为封山县，<sup>[110]</sup>属于越州，<sup>[111]</sup>即合浦郡<sup>[112]</sup>。蔡龙县乃宁纯在唐初所开。《广东通志》云，宁纯“善抚众招徕蔡龙峒民，辟其四境，请立为县”<sup>[113]</sup>。《读史方輿纪要》也记载，“唐初置。《新唐书》：‘县有蔡龙洞，因名也’”。据《明一统志》，东罗县也是“唐初置”<sup>[114]</sup>，大概也是由新开溪洞地区置县而来，不知原属地。宁纯或许出于对新王朝的恭顺，将所开蔡龙峒以及所属封山县交由中央政府，并在此设姜州。

贞观十年（636年），姜州废，所辖三县并入廉州。姜州能重新并入廉州应该与宁氏对唐王朝的忠诚相关。在宁道明与冯暄的叛乱中，钦州都督宁长真、廉州刺史宁纯积极参与平定叛乱，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力量。贞观年间，中庶子张玄素曾至廉州，见宁纯谨厚有礼，教其子弟读书，蛮俗向化，甚称奖之。<sup>[115]</sup>宁纯从孙宁原悌在武后永昌年间策贤良名列第九，官至谏议大夫<sup>[116]</sup>。但宁氏家族成员仍未放弃溪洞豪族的身份。唐中宗被废后，韦皇后父韦玄贞和妻女流放岭南，蛮酋宁承基兄弟逼夺其女，并杀韦氏夫人及其四子。中宗复位后命广州都督周仁轨征讨，宁承基被杀，其部众也被杀掠殆尽。<sup>[117]</sup>开元之后，宁氏家族再无人出现在历史记载中。<sup>[118]</sup>

钦州宁氏家族退出历史舞台象征着控制岭南地区数百年的溪洞豪族势力渐次消亡，科举制度、南选制度等在岭南地区得到推行，岭南社会加速融入大一统的秩序之中。然而，王朝的基层官员仍受到不服从者的困扰。唐代元稹在敕文《赠楚继吾等》中写道：“故容州本管经略招讨、左押衙兼行营中军兵马使、检校太子詹事楚继吾，故廉州古丘营镇将、试殿中监卫弘本等：比以荒服不虔，侵掠县道，乃诏毅勇，为人驱攘。而继吾等奋不顾身，深入巢穴，豺狼虽殪，蜂蛮误加。方闻振臂之雄，忽有归元之叹。”<sup>[119]</sup>楚继吾为了打击不宾服者而丧失性命，但这种侵扰事件无足轻重，既无法撼动大一统的历史轨迹，又无法改变逐渐汉化的历史过程。



#### 四、结论

秦征岭南，汉置合浦，中原王朝的大一统秩序随之延伸扩展至古越人聚居之“化外”之域。历代王朝对包括合浦在内的岭南地区的经略、控制和管理总体上呈现出中央集权体制日渐增强的大趋势，但其间亦不时出现波折和起伏。出于维护南海贸易及巩固交州统治的现实需要，汉王朝通过军事屯垦、移民实边等方式有效地增强了对合浦的管控，两汉时期流人贬官的接踵而至或许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汉王朝对合浦控制的有效性。而随着合浦郡地域空间范围开发的扩展、户口的增加，新的州郡不断增多，亦体现出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控制力的提升。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王朝对合浦虽仍维持名义上的统治，然而南朝末年至唐初廉州酋帅宁氏，如邻近的粤西高州冯氏一样，也以世袭州职的形式获得了地方社会的实际控制权。合浦及岭南社会大一统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非线性特征由此可见一斑。

合浦与岭南社会中古时代大一统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另一个重要体现为族群冲突与融合。汉代郡县地方行政体制的确立，合浦都尉等军事镇守系统的补充，商贾的往来，内地移民的迁入，这一切都在改变着合浦地区的族群结构与社会生态。然而族群关系从对立、冲突逐渐走向共处融合是一个漫长而充满着血与火洗礼的历史进程。汉唐之间合浦及周边地区叛服不定的动荡与战乱一方面固然暴露出历代王朝军政体制运作当中的种种弊政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水土不服”的治理状况的反复，其根源亦不能不归因于族群矛盾所造成的各方利益的冲突与博弈。这其中历代王朝地方军政管理体制与原生态族群的关系，编户体制如何纳入整合区域内的部族组织及群体，越人及后来的俚、僚等“化外”族群在与中原文明的接触碰撞中如何提升自身族群的管理能力、完善组织形态等一系列问题仍有待今后更为深入的研究。

尽管合浦及岭南地区的族群融合与向化之路漫长而曲折，然而其文明与社会生态的转型与演变却有迹可循。秦汉以前以渔猎经济为主的原生态文明及由此而形成的“越俗”是合浦史前时期的基本特征。秦汉大一统秩序的确立与逐渐强化，使中原文化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城镇的建立，农耕经济的发展，与合浦作为滨海地域所派生的海洋经济活动（包括海上贸易、渔业与采珠）相结合，逐渐演进为一个以华夏文明为主导，改造兼容原有风俗、生活方式等物质文化因素，而后形成的混合型的经济社会形态。考察这种有别于内陆地区的具有滨海地域特色的合浦模式，对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岭南古代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多元性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古时代的合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而据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一方面合浦作为早期南海贸易交通路线上的主要港口，承载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职能；另一方面与交趾隔海相望的态势，又令其在汉唐时期一直兼具中央王朝经营和控制交州的前哨和桥头堡作用。海上航路的变迁对合浦经济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交州政局与合浦治乱的互动，这

些问题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值得我们继续予以关注。

[1] 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3-21页，收入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第30-62页。

[2]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82，第2975页。

[3]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第188页。另据谭其骧《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第3-21页，九郡中珠崖、儋耳两郡设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书》将九郡之设系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不准确，此处为了行文方便，不再单独列出两郡，直接参照《汉书》的说法。

[4]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十七，中华书局，2007，第860页。

[5] 同上书，第861页。

[6]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中华书局，1965，第2836页。其中记载征侧、征贰姐妹为雒将之女。

[7]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62，第1174页。

[8] 涉及二征反叛的研究相当多。王子今：《马援楼船军击交阯九真与刘秀的南海经略》，《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5期，第94-100页；施铁靖：《试从征侧起兵的规模看其性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第73-80页；郭振铎、张笑海：《伏波将军马援与二征起事的若干问题》，《黄河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61-65页；曾丽虹：《二征夫人起义的性质和归属国问题》，《邢台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47-49页；桂光华：《试论“二征起义”》，《南洋问题》1985年第4期，第11-19页。

[9] 同[6]。

[10] 同[6]。

[11] [清]雍正《广西通志》卷九十四《诸蛮》，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47页。

[12] [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十二《马援传》，中华书局，2008，第430页。

[13] [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十二《马援传》，中华书局，2008，第430页。

[14]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十七，中华书局，2007，第860页。

[15] 谢启昆：《广西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第5893页。

[16]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中华书局，1965，第839页。

[17] 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没有关于岭南地区瘴疠的记载，多为对岭南异物的书写。从合浦一地来看，异物有吉利草、桂、合浦桐叶、眊藤、益智子、短头细黄鱼等。对岭南瘴疠的书写多出现在唐代。唐代诗文中连篇累牍地描绘瘴疠的恐怖。对这一问题全面的研究可参考陈思维：《从异物到乡邦：明代以前的岭南书写及其意义》，《学术研究》2017年第5期，第148-154页。

[18] 王承文：《唐代流放和左降官制度与北方家族移民岭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85-101页。

[19] 关于两汉徙合浦的事例，前人在研究中已经做了相应的统计。[日]大庭修：《汉代的徙迁刑》，载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36-161页。据其统计徙往合浦的例子共计十例。本文表1第6、9、13、15例不见于大庭修的著作中。蒋廷瑜：《略论汉“徙合浦”》，《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1期，第86-89页，其中所收集的例子较全。然蒋廷瑜文中“诸前议立庙号尊号的杜业、董宏、师丹、朱博等人皆免官，‘徙合浦’”，似有失误。师丹在汉哀帝立庙尊号事件中和王莽同持反对意见，因此不曾被徙往合浦。根据《汉书》卷八十五《谷永杜业传》，杜业没有被徙往合浦，只是免官归故郡。此外，在《汉书》卷六十一《杜周传》中记载：“哀帝崩，王莽秉政，诸前议立庙尊号者皆免徙合浦。业以前罢黜，故见润略。”关于“润略”一词，颜师古注曰：“润略谓宽纵不问也。”也就是说杜业由于之前已经被免官，因此没有被徙往合浦。根据《汉书》卷八十三《薛宣朱博传》，朱博在诏狱自杀，也没有被徙往合浦。而董

宏的情况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存疑。

[20] 据《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记载，陈希烈被赐死（中华书局，1975年，第250页），与《全唐诗》的记载相异。

[21] [日]大庭修：《汉代的徙迁刑》，载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36-161页。

[22] 同上。

[23]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四《广东》，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第4753页。

[24]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第1671页。

[25] [美]安赋诗：《边疆和边界——汉帝国的南部边陲》，赵德云译，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0，第135-150页。

[26] 杜树海：《试论两汉时期合浦郡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广西地方志》2005年第3期，第45-50页。

[27] 同[23]，第4755页。

[28] [明]李贤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二《廉州府》，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601页。

[29] 同[24]，第1670页。

[30]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中华书局，1965，第838页。

[31] 同上。

[32] 王承文：《晚唐高骈开凿安南“天威遥”运河事迹释证——以裴鏘所撰〈天威遥碑〉为中心的考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三分，2010年第3期，第597-650页，收入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18，第328-432页。

[33] [清]道光《廉州府志》卷首，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34] 谭其骧：《自汉至唐海南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洗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第3-21页。

[35] [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三《薛综传》，中华书局，1982，第1252页。

[36]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十一《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二十一·贾琮传》，中华书局，1965，第1111页。

[37] 同上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第六十六》，第2473页。

[38] 同上书，卷八《孝灵帝纪第八》，第349页。

[39] 同[36]。

[40] 同[35]，卷七十六《循吏传》，第2157、2462页。

[41] 葛兆光：《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第76页。

[42] 同[36]，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第2834页。

[43]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十四《贾捐之传》，中华书局，1962，第2834页。

[44]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六《循吏列传第六十六，任延传》，中华书局，1965，第2462页。

[45] [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三《薛综传》，中华书局，1982，第1252页。

[46] 同[43]，第2830页。

[47] 同[45]，第1251页。

[48]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五《四夷部》，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第4626页。

[49] 王承文：《晚唐高骈开凿安南“天威遥”运河事迹释证——以裴鏘所撰〈天威遥碑〉为中心的考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三分，2010年第3期，第597-650页，收入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18，第328-432页。

[50] 同上。

[51] [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中华书局，1982，第151页。



- [52]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四《广东》，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第4754页。
- [53]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七《陶璜传》，中华书局，1974，第1558页。
- [54] [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中华书局，第1167页。
- [55] 参考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西晋卷），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30-31页。
- [56] 王承文：《晚唐高骈开凿安南“天威遥”运河事迹释证——以裴鏞所撰（天威遥碑）为中心的考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三分，2010年第3期，第597-650页，收入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18，第328-432页。
- [57] 葛剑雄编《中国移民史》（先秦至南北朝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第264页。
- [58] 同[54]，卷四十九《士燮传》，第1191页。
- [59]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七《陶璜传》，中华书局，1974，第1158-1561页。
- [60]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九十二《杜慧度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3-2265页。
- [61] 王承文：《中古岭南沿海宁氏家族渊源及其夷夏身份认同——以隋唐钦州宁氏碑刻为中心的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一辑，2015年7月，第196-228页，收入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18，第52-103页。
- [62] [越]黎崱：《安南志略》卷十五《人物》，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2000，第345页。
- [63] [北宋]司马光编著，[宋]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唐懿宗咸通二年六月”条，中华书局，1956，第8094页。
- [64] 同上书，卷二百四十六“宣宗大中十二年七月”条，第8072页。
- [65] 葛剑雄编《中国移民史》（先秦至南北朝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第47页。
- [66]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一百零九《志第二十三，郡国五》，中华书局，1965，第3531页。
- [67]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第465页。
- [68]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三十八《州郡四》，中华书局，1974，第1197页。
- [69]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第468页。
- [70] 参考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 [71] [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三《薛综传》，中华书局，1982，第1253页。
- [72] 同上书，第1465页。
- [73] 同[69]，卷五十七《陶璜传》，第1560页。
- [74] 同[73]。
- [75]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九十二《杜慧度传》，中华书局，1974，第2264页。
- [76] “僚”，原文为“獠”。
- [77]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中华书局，1972，第267页。
- [78] “俚僚”，原文为“狸獠”。
- [79] [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十八《林邑国传》，中华书局，1975，第1951页。
- [80] 同[76]。
- [81] 同[77]，第262页。
- [82] [唐]杜佑：《通典》卷五《食货》，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90页。
- [83] 同[75]，卷五十四《羊玄保传》，第1538页。
- [84] [唐]姚思廉：《梁书》卷三十二《兰钦传》，中华书局，1973，第466页。
- [85] [唐]姚思廉：《陈书》卷二十一《萧引传》，中华书局，1972，第290页。
- [86] 同上书，卷十二《徐度传》，第188页。
- [87] [唐]魏征等：《隋书》卷二十九《地理上》，中华书局，1973，第807页。
- [88] 同[77]，第269页，记载萧齐时期，越州下辖临漳、合浦、永宁、百梁、安昌、南流、北流、龙苏、



富昌、高兴、思筑、盐田、定川、隆川、齐宁、越中、马门、封山、吴春俚、齐隆等二十郡。

[89] 同[75]，卷三十八《州郡志》，第1208页。

[90] [唐]魏征等：《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中华书局，1973，第884页。

[91] 关于钦州宁氏的研究可参看王承文：《中古岭南沿海宁氏家族渊源及其夷夏身份认同——以隋唐钦州宁氏碑刻为中心的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5年第三十一辑，第196-228页，收入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18，第52-103页。

[92] “僚”，原文为“獠”。

[93]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九十七《林邑国传》，中华书局，1974，第2379页。

[94] 同上书，卷八十六《刘勰传》，第2191-2192页。

[95] [唐]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卷二十一《颍川郡太夫人陈氏（神道）碑（铭并序）》，中华书局，2013，第1044页。

[96] 关于雷州陈氏研究可参看王承文：《论唐宋岭南南部沿海的雷神崇拜及其影响：以唐人房千里所撰〈投荒杂录〉为起点的考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四本第三分，2013年第3期，第387-453页，收入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18，第874-974页。

[97] 同[96]。

[98] 王承文对这两个碑刻研究最深入。参看王承文：《中古岭南沿海宁氏家族渊源及其夷夏身份认同——以隋唐钦州宁氏碑刻为中心的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5年第三十一辑，第196-228页，收入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18，第52-103页。

[99] 同[98]。

[100] [清]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九十九《列传三十二唐》，清道光二年刻本，第4147页。

[101]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廉州合浦郡”条云：武德四年曰越州，贞观八年更名，以本大廉洞地。

[102] [北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四《帝王部》，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第1827页。

[103] [北宋]司马光编著，[宋]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高祖武德五年四月”条，中华书局，1956，第5951页。

[104] 同[101]，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传》，第6326页。

[105]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传》，中华书局，1975，第6326页。

[106]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冯盎传》，中华书局，1975，第3288页。

[107] 《北史》卷九十《艺术传》、《隋书》卷六十八《何稠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隋开皇十年冬十一月”条。

[108] [北宋]乐史编《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七《岭南道十一》，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第3197页。

[109] 同[106]，卷四十一《地理志》，第1759页。

[110] [南宋]王象之编著《輿地纪胜》卷一百二十《广南西路》，赵一生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第2747页。

[111]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四《广东》，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第4754页。

[112] [唐]魏征等：《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中华书局，1973，第884页。

[113] [清]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九十九《宁纯传》，清道光二年刻本，第4148页。

[114] [明]李贤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二《廉州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605页。

[115] [清]康熙《合浦县志》卷十《乡贤志》，清康熙年间钞本。

[116] 同[113]。

[117] [宋]司马光编著，[宋]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唐中宗神龙二年六月”条，中华书局，

1956, 第 6603 页。

[118] 王承文：《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第 89-102 页，收入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18，第 104-139 页。

[119] [唐]元稹：《元稹集》卷五十《赠楚继吾等》，翼勤点校，中华书局，2010，第 636 页。